

江苏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目(00SJD720003)

社会转型 与现代伦理

窦炎国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目 (00SJD720003)

社会转型与现代伦理

窦炎国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与现代伦理/窦炎国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

ISBN 7-5620-2558-4

I. 社... II. 窦... III. 伦理学-研究-中国 IV. 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2786 号

书 名 社会转型与现代伦理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本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20-2558-4/D·2518
定 价 22.00 元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 话 (010)62229563 (010)62229278 (010)62225059
电子信箱 zlf5620@263.net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网络实名:法律教材)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发现缺页、倒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社法律顾问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目 录

绪 论 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学思考.....	(1)
一、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基本特征.....	(1)
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进程及其伦理困惑和 道德危机.....	(5)
三、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伦理困惑和道德 危机.....	(8)
四、中华民族的伦理追求和道德前景	(16)

第一篇 伦理原理

第一章 伦理学的元问题	(27)
一、伦理学的意义	(27)
二、伦理学的功能	(31)
三、伦理学的证明方法	(35)
第二章 伦理学的对象问题	(40)
一、康德对伦理学对象的规定	(41)
二、恩格斯和列宁对伦理学对象的看法	(44)
三、伦理学对象的历史规定性	(47)
四、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现实课题	(49)

第三章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52)
一、社会生活的基本矛盾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52)
二、伦理学的对象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56)
三、伦理学的范畴体系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59)
四、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62)
第四章 道德主体和道德主体性问题	(65)
一、道德的主体和道德活动的主体	(65)
二、道德的主体性和道德活动的主体性	(68)
三、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道德	(71)
四、道德活动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	(76)
第五章 现代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原则	(80)
一、道德生活基本原则的规定性及其特征	(80)
二、传统规范伦理学关于道德基本原则的规定	(84)
三、现代伦理学确立道德生活基本原则的现实根据	(88)
四、现代道德生活基本原则的实质内容	(93)
五、现代道德生活基本原则的展开形态	(97)
第六章 道德评价及其标准体系	(101)
一、道德评价的内容与形式	(101)
二、道德评价的标准体系	(105)
三、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	(107)
第七章 职业劳动与职业道德	(111)
一、职业道德的实质：劳动规则	(111)
二、职业道德的内容：服务规范	(115)
三、职业道德的特征：创造理性	(119)
第八章 应用伦理学及其有关问题	(123)
一、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123)
二、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125)
三、应用伦理学的一般方法	(127)

第二篇 经济伦理

第九章 经济伦理的性质	(133)
一、经济伦理的一般规定	(133)
二、经济伦理的特殊性质	(139)
三、经济伦理的现实意义	(144)
第十章 经济伦理学的方法	(150)
一、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定位	(150)
二、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52)
第十一章 经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问题	(155)
一、康德提出“二律背反”的本意	(155)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二律背反”根源的揭示	(158)
三、列宁对“二律背反”实质的分析	(160)
四、我们面临的“二律背反”问题	(162)
五、我们解决经济与道德“二律背反”的方法	(164)
第十二章 评“市场经济与道德划界”论	(168)
一、市场经济并不排斥道德	(168)
二、道德并不要求超功利性	(172)
三、金钱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尺度	(176)
四、结论：做有道德的经济人	(179)
第十三章 市场经济与道德观念的变革	(184)
一、道德观念的变革应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据	(184)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道德的 实质内涵	(187)
三、社会主义道德是过渡形态的公民道德	(192)

第十四章 传统道德与市场秩序	(197)
一、经济秩序的社会文化背景	(197)
二、市场秩序的反传统性质	(199)
三、传统道德对市场秩序的积极意义	(201)
四、传统道德向市场秩序的转换	(205)
第十五章 市场经济和市场道德建设	(208)
一、发展市场经济必须讲市场道德	(208)
二、发展市场经济完全能够讲市场道德	(210)
三、市场道德的两大基石：诚信和服务	(212)
第十六章 商业劳动和商业道德	(214)
一、商业劳动的一般特征	(214)
二、市场经济对商业劳动的影响	(217)
三、服务——现代商业道德的核心范畴	(219)
第十七章 论无害化生产	(222)
一、生产及其价值的实现形式	(222)
二、无害化生产的实质及其评价标准	(226)
三、无害化生产的现实途径	(229)

第三篇 以德治国

第十八章 “以德治国”的实质和标准	(235)
一、“以德治国”的实质含义	(235)
二、“以德治国”的主体和客体	(237)
三、“以德治国”的阶级性与共同性	(240)
四、“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243)
五、“以德治国”的评价标准	(246)

第十九章 “以德治国”的科学依据

- 道德信息反馈图式 (250)
- 一、道德作为社会信息的意义 (250)
- 二、道德信息反馈的图式 (255)
- 三、道德信息反馈图式的理论启示 (259)

第二十章 “以德治国”的文化前提

-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及其当代转型 (264)
- 一、伦理文化的存在形态 (264)
- 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流和实质 (267)
- 三、传统伦理文化的当代转型 (272)

第二十一章 “以德治国”的社会基础

- 小康社会与公民道德 (278)
- 一、小康社会的价值目标 (278)
- 二、小康社会的伦理关系 (283)
- 三、小康社会的道德要求 (287)
- 四、小康社会的人格理想 (292)
- 五、小康社会的行为方式 (295)

第二十二章 “以德治国”的现实路径

-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299)
- 一、公民道德的性质 (299)
- 二、公民道德的精神实质 (301)
- 三、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 (304)
- 四、公民道德建设的意义 (306)
- 五、公民道德建设的途径 (308)

第二十三章 21 世纪的公民伦理教育 (311)

- 一、传统伦理生活的局限性 (311)
- 二、传统伦理生活的现代性后果 (313)
- 三、21 世纪的生活伦理 (314)

6 目 录

四、21 世纪的伦理教育	(317)
第二十四章 儒学道德教育观借鉴	(319)
一、地位作用：为政之要，六艺之首	(319)
二、理论依据：儒学人性论	(322)
三、方法论原则：早教幼学，致用务实	(326)
第二十五章 重塑良心	(331)

绪 论 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学思考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在经济生活的工业化、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文化生活的多样化、思想观念的理性化等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新时期。但是如同人类历史上所曾发生的一切深刻变革一样，人们在追求并面对急剧的物质生活变革时，又不得不同时间面对并经受痛苦的精神生活的变革。世代相传的美德和几十年革命化教育养成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被商品、货币和市场竞争冲击得七零八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理想信念面临崩塌的危险。

人们一时间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思想困惑和感情冲突之中：物质富裕与精神高尚、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真的是两相对立，不可通融的吗？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明：代价论，划界论……。不管怎样，一切有责任心的理论家、学者，都会在自己专业所涉及的范围来思考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这种困惑，并努力提供合理的答案。伦理学工作者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伦理学家更有一种道义的职责：分辨是非、扬善抑恶、塑造美德。

一、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基本特征

要解决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思想困惑问题，就需要了解并分析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进程及其特征。

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可以追溯到 1844 年鸦片战争。但是，

如果从具有实际意义的严格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应当是开始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此前百余年中，中国社会曾经经历过翻天覆地的变革，只是未能在现代化进程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然而却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必不能缺的前提条件，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前奏期和准备阶段。弄清这一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特点，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及其特征，则是至关重要的。

众所周知，东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是有明显区别的，其主要的也是基本的特点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与封建宗法专制政治和血缘家属主义伦理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顽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运行机制，因此能够超乎寻常地维持传统生产方式而抗拒变革。这正是为什么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一切源自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和争斗都未能导致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原因。但是，一旦当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面临的危机就不仅仅是军事的、技术的，而且同时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此，传统社会运行机制的自我修复能力遭受到的打击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时，清醒的、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才真正的开始反思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利弊得失，寻求救国救民之策和强国富民之道。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继而也有了五四运动、国内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百余年间，中国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入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冲突，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精英也都无一例外地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登台亮相。政权的更迭、政客的过往、理论的替换、信念的变幻，其频繁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此可见由西方列强入侵而引发的中国的社会变动，不仅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瞬时性和递进性。这正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在其起始阶段就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点。

如果我们具体考察这一百余年间的历史变迁，则可以进一步确

证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所具有的现实条件。

第一，我们看到，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上取得优势之后，市场的世界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便已开始。在这种情势下，任何国家都难以孤立地生存和发展。传统中国的闭关自守局面之所以被打破，决不能仅仅归结为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应当归结为是新的生产方式战胜并取代旧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历史事实曾经并将继续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但是，社会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对待社会发展的问题是不可以感情用事的。只有打开国门，才能启动现代化进程，这已成为一切后发展国家的必由之路。但是，中国的国门是被帝国主义列强强行打开的，而不是中国人自觉自愿打开的。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中国人民在传统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先是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接着是奋起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中由于过分强调自立更生而导致向闭关锁国老路子的回归，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我国的社会现代性转型的进程。这就清楚地说明，面对市场的世界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新情势，只有自觉地用世界性的眼光来观察和对待本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才有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新起点，恰恰就在于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而确认了这一点。

第二，我们看到，直至20世纪初叶中国仍然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无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先后清醒地意识到彻底改变这种小生产方式乃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根本环节和艰巨任务。但是在如何抓住这一环节并解决这一任务的问题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却产生过长期而尖锐的分歧和争论。正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和中国农民阶级的庞大，导致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领导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伟大历史

进程。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从工业学大庆到农业学大寨，从克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到两弹试爆，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经济、变革社会的决心、魄力和智慧。但是，也正是由于人们低估了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巨大影响，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未能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制度上实现现代性变革，反而导致传统陋习得以借用激进方式来阻挠经济和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极“左”思潮的畅行无阻和“文化大革命”的泛滥成灾，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推进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未能充分正视并坚决清除小生产习惯势力对自身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未能及时以现代性的要求来塑造自身。这就是说，只有当主体自身能够自觉摆脱传统的、非现代性的束缚时，才可能有效地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这也就是说，经济的转型必须以思想观念的转型、政治的转型、组织制度的转型、社会生活的转型同步进行为条件。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面貌一新的事实，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我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所无法讳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回顾一百余年的历史，不难看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争对于社会变动的重大影响。几乎可以认为，明清以降的中国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故都是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是孔孟之道）为舆论和思想先导的。但是，我们也几乎可以认为，任何一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未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甚至在每一次批判过后，人们似乎愈发为传统文化所纠缠了。真所谓“剪不断，理还乱”！何以如此？这正是由传统文化之为文化传统的本性所使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基于是历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及其历史活动的创造性成果的累积。严格讲，文化的累积过程就是文化的批判和继承过程，就是文化的延续和创新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经变故、延续至今，正是因为它经过几千年的累积，已经千锤百炼而能够弥久恒新，并融铸为民族的灵魂而可以统

摄民众的信仰和意识。当然，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均包涵有不同性质的组成成分，诸如主文化与亚文化、主文化与反文化、恒久文化与易变文化、精华与糟粕等等。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的文化传统必定是与这个民族共存亡的。如果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的那种文化传统被消灭了，那么这个丧失了灵魂的民族也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否定性。这样，对于试图通过现代性转型以实现复兴的民族来说，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便成为难以讳避的现实问题。换言之，能否妥善地实现文化的转型，乃是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这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华民族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及其面临的现实条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其一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其二是变革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其三是实现文化转型的深刻性。要恰当地理解上述特点，就需要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我们面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使命，即不仅要有宏大的眼界而且要有深沉的历史感。

二、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进程及其伦理困惑和道德危机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社会转型进程，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都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伦理困惑和道德危机。而社会转型的实现程度，一般也与这种伦理困惑的破解和道德危机的消除程度成正相关关系。诸如奴隶主私有制取代原始公有制的转型过程，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转型过程，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的转型过程，都是如此。这里以大家熟悉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情形为例，来简要剖析社会转型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以为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借鉴。

根据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铁器工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促成了生产工具的

革命性变革，由此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相当数量的农民摆脱了井田制的束缚而演变为新型的自耕农便是最明显的表征之一。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礼崩乐坏”的严重道德危机，伦理困惑笼罩着各个阶层，背礼违制的失范现象比比皆是，臣弑君、子弑父、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之类丑恶事件史不绝书。于是，为了解疑惑济时世，各种主张纷纷出笼。诚如《汉书·艺文志》所云：“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更有孔夫子四出奔走呼号，力主“克己复礼”。但终孔子有生之年，其伦理道德主张几乎未能为任何一个掌权当政者所赞同和采纳。如墨翟“兼相爱”、“交相利”之说，其命运也大抵相同。倒是以为“祖宗不足法”、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安邦之法家学说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影响日甚，终于成为秦一统天下的理论武器。这一历史进程表明，在社会转型期的开始阶段出现社会道德危机和伦理困惑似不可避免。在这一阶段上，与原有社会结构相协调的社会秩序会因为这种社会结构的迅速瓦解而被破坏，新的社会结构及其与之相适合的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于是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权威和管理的“真空”状态，从而诱发思想的偏狂和欲望的膨胀，最终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混乱。在这种情形下，依靠伦理道德的力量是不足以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的，惟一可行的是依靠法制和强制手段。

但是，秦始皇的“严刑峻法”和“焚书坑儒”并未能真正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反而加速了新政权的灭亡。新兴的地主阶级究竟应当怎样来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汉代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孔子“克己复礼”主张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于是导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论。事实证明，汉代统治者的这一社会文化对策对巩固自己的政权和重建社会秩序产生了关键性的积极作用。我们知道，孔子“克己复礼”主张的实质涵义在于继承和发扬华夏的伦理文化和传统美德。孔子及其后继者（主要有孟子）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实际，对以“周礼”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新的概括和阐发，建立了以“仁”、“义”为核心范畴的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但由于当时尚处在“破坏旧制度”的阶段，孔孟均不可能提出并建立新的、与封建社会结构相适合的、完整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汉代的“独尊儒术”，使孔孟之道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并据此大体归纳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使新兴地主阶级为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未能依据社会转型进程的客观条件（包括要求和可能）来对丰富的华夏传统文化加以全面的创新，相反倒是强化了儒家学说的某些消极方面（如鬼神迷信、天人感应），因而不可能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文化精英发挥创造性才能的需要，反而会引发他们的不快和愤懑，进而促使他们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来对抗儒家学说和反叛社会生活秩序。所以，汉末的战乱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动荡，便与反道德主义的勃起和玄学的兴盛相辅相成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表明，中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转型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具备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因此华夏传统文化能够借孔孟之道这一现实形态而上升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并为规范社会生活而发挥实际的功效。但是，由于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毕竟还是刚刚确立的新事物，其不完善性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在这个阶段上还不能算是社会转型的最终完成期，无论是新的社会结构还是与之相适合的社会生活秩序也均未取得绝对的巩固地位。因此，政局反复和社会生活秩序混乱，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道德危机和伦理困惑，都还可能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与社会生活的这种实际状况相对应，由社会转型引发的传统文化的转型问题——传统文化对于新兴文化的认同和新兴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吸纳——尚未最终完成。

中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转型是在唐宋时期最终完成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的完善和封建制社会生活秩序的巩固，以及儒家

伦理发展到理学的新水平，这些均是中国封建制转型最终完成的基本标志。在这之后，由向封建制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道德危机和伦理困惑不复存在。当然这决不是说此后的社会生活中不再会出现道德危机和伦理困惑，而只是说此后出现的道德危机与伦理困惑已不再是由前期的社会转型——传统文化的失落所引发的，相反倒可能是现实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所引发的。诸如不同阶级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原文化与边缘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都曾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引发过道德危机和伦理困惑。如果现存文化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这就表明这种文化正在失去现实性而日益演化成为传统文化，这也预示着新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于是，传统文化的再失落又将成为新的社会转型期引发道德危机和伦理困惑的原因。

经过唐宋元明清一千三百余年的发展，儒家学说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终于渡过了鼎盛期而日益丧失其现实性。从中国社会步入现代性转型期开始，一再掀起了对儒家学说的批判运动，这应该说是属于历史的必然。但由此也的确引发了这样或那样的道德危机和伦理困惑，这正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一再面对的社会实际情形。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来分析和对待这种道德危机和伦理困惑。

三、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伦理困惑和道德危机

由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规定，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伦理困惑和道德危机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来看这种伦理困惑和道德危机的现象形态。

最早的典型表现应该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的“潘晓事件”，即由于《中国青年》发表潘晓的来信而引发的一场颇为牵动人心的争论，其主题是：人性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潘晓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人只能做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